回　　忆　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决死第三纵队前一段历史情况的回忆

戎 子 和

1939年十二月事变，距今虽已 42年多了，但我对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三纵队的成长、战斗和在十二月事变中的损失仍记忆犹新。为了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教训，缅怀为党为人民英勇牺牲的烈士,我不以辞拙,聊草此文,以了结多年心愿。

一、在斗争中创建

在日军侵占天镇、大同,向雁门关、平型关进犯时,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总队(简称决死三总队)继决死一总队之后,于 1937 年 9月中旬在寿阳县成立。决死三总队（约一个团）系原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十团改编而成。总队长由原教导十团团长李冠军担任，我任总队政治委员，暂兼政治主任。部队成立不久，即开赴太原，后又南下到曲沃。

决死三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经过太原军政训练班训练，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其中少数是共产党员。军事人员从团长到班长都是旧军人出身，而且是原防共保卫团的底子，队员是招考来的知识青年。

教导十团于 1937 年 5月初成立时,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做阎锡山的工作,保护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改造好这支队伍。当时我在阎锡山那里是个“同志会”干部委员。为了便于工作，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直归中共山西省工委领导，在

团里，只与党员高治国同志有联系。

阎锡山成立决死队等新军，是我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公开的、秘密的关系向他建议的。他当时正处于困境，他的旧军在天镇溃败后，纷纷后退。为了挽救他即将覆灭的统治，他同意成立新军。这在薄一波写的《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一文中说的很详细，我就不再赘述了。

1937 年 9 月下旬，日军攻破雁门关、平型关等地。阎锡山惊慌失措，以为日军很快就要冲到太原，因而他从雁门关内代县太和岭口临时行营撤退时，不敢沿同蒲线的大路走，而绕道五台，退回太原。当时太原仅有两个团，一个是干训团，另一个是什么团记不得了，实际上是一座空城。那时日本飞机已轰炸太原，留守太原的赵戴文没有办法，于 28 日急电调驻寿阳的决死第三总队赶到太原参加防卫。我总队赶到后，驻南郊狄村一带。我随即向山西省工委张友清请示机宜。友清告诉我："我们党不赞成死守太原，特别不赞成用山西新军来守。党正通过公开和秘密关系向阎锡山建议，不在太原决战"。他要我见了阎锡山和梁化之等人，也提出这个意见。我见了梁向他讲了这个意见后，因为事关重大，梁也不敢表态，只说"你等消息吧"。

过了两天，阎锡山回到太原，神情十分狼狈。

日军攻陷繁峙县后，因在平型关、崞县、原平接连遭受挫折，迟疑了十来天，未敢南下。这时，蒋介石已调卫立煌部从河北涿县一带赶到太原。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相继开到晋北一带，一二九师也正兼程向山西进发。阎锡山和卫立煌见面后，决定改在忻口会战。

阎锡山命令决死第三总队于 10 月初由太原开到曲沃。我们到曲沃时，省委指派胡熙安到总队为我和省委之间的单线联系人。不久，胡即由我推荐到汾城县任县长。胡走后，省委派杨献珍接替他的工作。杨到总队后，和我商量好，请董天知任总队政治主任。董大概是 11 月底到决死三总队的。

教导十团改编为决死三总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新旧两种力量尖锐斗争的。原来,李冠军等人认为决死队不正规,不赞成改编 还怕失掉他们的特权,不愿有个政治委员来干预他们的权力,因而更不赞成政治委员制度。决死三总队开到曲沃后,李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虽不敢公开反对改编,但却仍然按照他在教导十团的一套老办法行事,遇事不与我商量。我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改变态度,但他执迷不悟,根本不听劝告。致使总队内军政磨擦愈演愈烈。

李冠军是一个反共军官, 1936 年红军东渡山西前后, 他任山西防共保卫团团长, 政治关系相当复杂。他一到曲沃, 就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拉上了关系。平素自称他同陈诚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同学,他到中央军也能吃得开等等。我们认为此人实在太顽固,不得已报告阎锡山,要求将他调离,并提议由比较进步的总队三大队大队长王振明(王子玉)接任。阎同意我们的意见,下达了调离李的命令, 并委任王子玉为决死三总队总队长。

李冠军接到调令后,拒不执行,不办理交接手续,每天在家里和他的几个亲信密谋策划, 准备叛变。

1937年 12 月 22 日上午, 李冠军企图带部队投靠国民党军队,便带着他的几个马弁闯进曲沃营盘,召集军官开会,布置叛变计划。一时,营盘气氛十分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晚,李向部队讲话,嘶声喊叫说"要组织西北抗日联军,到中条山去打游击。""到哪里不能抗日!"煽动大家跟他走。与此同时,他把部分政工人员监禁起 ,预定叛变成功后,要先进城杀害我和董天知,他并事先密令其亲信王恒山 (李派到曲沃县自卫队任军事教官的一个排长),听见枪声号令即带队伍哗变 还密令军需官樊××携款先到指定地点待命。

在这紧急关头,我们采取了非常措施。除急电阎锡山报告李冠军叛变外,立即给随营学校第二队学生发了枪支,并抽调部分军政人员和模范队(由总队抽调积极分子组成的干部候补队)封锁了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沃县城。这时王恒山因等不及信号，就抢先枪杀我自卫队指导员王兆祥，带队伍叛逃了。我们当即电话通知绛县县长和牺盟会特派员，派自卫队和警察截拿王恒山。

一场叛变与反叛变的斗争，到了决战时刻。由于我党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绝大部分军人不愿意跟李冠军叛逃。双方相持了一天半。第二天傍晚，阎锡山派新军教导总部参谋长韩栋材到达曲沃，将李带回临汾软禁起来。李自知罪恶严重，在借口上厕所时自杀了。

这次事件中，除王兆祥牺牲和军需官樊××携款偷跑,王恒山在绛县被我围攻脱逃外,其他没有什么损失。“曲沃事件”的胜利解决，为决死三总队的发展除掉了一大障碍。

二、在战火中发展

1937 年底，决死三总队发展为七、八两个总队。后来，又将驻运城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六团和第七团一部分改编为决死第九总队。以这 3 个总队组建成决死第三纵队。

1938 年 1 月初，新军教导总部总指挥杨爱源[1] 亲自到曲沃同我们研究军政干部配备问题。我们为了把部队掌握在党的手中，准备将表现好的旧军官提升一些，将政工人员中有军事经历以及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担任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并将向八路军要来的红军干部担任政治指导员。杨爱源对干部情况，尤其是军事干部的经历问得很详细。问到两位红军干部时，我们说是从杂牌军过来的,并将他们的名字也改了,应付过去。研究的结果,都按我们的意见通过了。各总队军政领导干部是：七总队总队长王子玉(原三总队总队长),政治主任马适安;八总队总队长刘宝堂(原教

[1] 1937 年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临汾，成立了新军教导总指挥部，杨爱源为总指挥，韩栋材为参谋长。指挥部主要管理新军编制和发饷等事宜。

导十团中校团附），政治主任由董天知暂时兼任；九总队总队长赵世铃，政治主任任映仑。赵世铃亦系原防共保卫团团长，政治上十分反动，满脑子法西斯思想。阎锡山因他亲蒋，并不重用。后因在秋林受训时出卖决死队，始得到阎和王靖国的信任。与此同时，阎委任陈光斗(字耀三)为决死三纵队纵队长,我为政治委员,董天知为政治主任,颜天明(承嘏)为参谋长(陈、颜两人于大革命时期,在国民第三军曾参加过共产党，后被徐永昌发觉，强迫脱离组织关系。颜后来重新入党)。他俩到任后,政治工作加强了。从此,军政磨擦显著减少。

决死三纵队组成后，山西省委指定主管军事工作的黄骅指导我们的工作。

1938 年 2 月 16 日,阎锡山在襄陵县温泉村召集军、政、民(牺盟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团结抗战，补充军队和开展敌后工作等问题。这时,阎迫于当时抗日形势，特别是他从武汉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回来后，兴起了一股既不同于蒋介石、又不同于共产党的具有‘独特’形式的‘民族革命风”。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则改称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办起‘民族革命大学”。会议决定把“自强救国同志会”改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并扩大同志会高干领导名额,吸收部分旧军长为委员。又建立‘民族革命青年团”。青年团的总团部委员，大多是牺盟会和新军决死队等负责人。后又成立“民族革命通讯社”。会议还没有开完,因日军进攻临汾,攻击晋南,即草草结束。

临汾是晋南重镇，阎锡山原想死守，指派彭毓斌为临汾警备司令，我为政治委员，调决死三纵队参加守卫临汾。鉴于阎的旧军垮了，新军刚成立，如同不赞成死守太原一样，我党也不赞成死守临汾。因此，我一面接受阎指派的任务，一面建议阎改变死守临汾的决心。看阎的态度,是怕全国和山西人民责备,不能不装个样子,以应付舆论。

当时,纵队部和七、八总队分驻曲沃、新绛、翼城一带。2 月 22

日接到命令后,即向临汾集中。24 日,陈光斗率九总队从运城到达临汾。因日军第一○八师团攻陷东阳关和长治后,以一个旅团,沿临屯公路(临汾至屯留)疾行西进。这时阎锡山才改变了死守临汾的态度,要陈光斗带九总队前往阻击,并加拨旧军四○四团附一个炮兵营归陈指挥作战。

决死三纵队第九总队由临汾出发,行至洪洞古逻一带时,发现敌人已越过安泽县良马、府城,我们就立即在古逻展开部署,构筑阵地。25 日中午开始火力接触,我九总队和四○四团及炮兵营与敌激战一日,毙伤敌约 300 余人,我伤亡甚微。后因敌众我寡,傍晚,我军撤至浮山县境。

28 日,临汾失守。我们部队退到浮山时,遇到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周桓同志。他向我们传达了阎锡山任命朱德总司令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司令,并将决死三纵队拨归朱总司令指挥的决定。周还传达朱总司令指示,不要我们正面死顶住敌人打硬仗,要从两旁侧击,阻滞敌人前进。我纵队属朱德总司令指挥,大家从内心感到十分高兴。朱德总司令对决死三纵队的成长非常关怀。2 月 28 日,当纵队的模范队(属七总队编制)由曲沃转移到浮山石口子村时,被日机轰炸,伤亡 20 多个同志。指战员遭此打击后,非常悲痛,连饭都吃不下。朱总司令得悉后,亲自到部队探视慰问,并讲了话,对安定情绪、鼓舞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

3 月 1、2 日,沿曲高公路(曲沃至高平)进攻的敌人,在侵占沁水、翼城后,占领了曲沃。我纵队部移至浮山山交一带。同月下旬,将七总队、八总队布置在翼城、曲沃、绛县一带,一面整训、扩军,一面袭扰曲高公路沿线之敌,将九总队集中在沁水、浮山一带,相机收复沁水。

3 月下旬,我九总队 1 个大队轻装,夜袭沁水县城。当我军接近北城墙时,被敌人发觉,战斗就此打响。我 1 个中队奋勇登城,1 个分队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战斗。敌人从两侧向我登城的指战员围击。我军在敌人强大火力猛烈阻击和后续部队上不来的情况下,下

令撤退。不幸部分战士被敌人围住，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约半小时，我 7 位战士身负重伤被俘。敌人劝他们投降不成，即行枪杀。战士们就义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为了民族利益甘洒热血的高贵品德。敌人一个大佐，为了利用这 7 位战士的勇敢和坚决精神，鼓励他的部下，特在沁水县城东北挖墓集体埋葬，并在墓上立了一块木牌，上写“支那勇士之墓”。几日后，敌军即仓皇撤退，沁水县城被我军收复。不久，翼城之敌也弃城逃走。

日军侵占晋南后，我决死三纵队在同蒲铁路南段两侧的临汾、曲沃、翼城、新绛、稷山、绛县、闻喜、夏县、平陆、安邑、解县、虞乡等地，展开游击战争，扩充队伍，甚为顺利。

7 月下旬，民大第四分校组成的两个游击支队和同蒲铁路职工自卫队，以及吸收王学林在安邑、夏县一带组织的游击队和部分地方武装，由雷震统一指挥，在安邑、夏县、稷山、猗氏等县开展游击战争。10 月在浮山山交村组成为游击第十团。团长为雷震（红军团长）政治主任先是张维翰，后是戴云程。

8 月间，以在临汾、翼城、浮山、安邑一带发展的几支游击队为主，加上在临汾反正的皇协军近一个营，组成游击第十一团。李其昌（旧军人）为团长，杨绍曾为政治主任。在此之前，还发展了一个游击十支队。支队长为陈雉卿（旧军人），政治指导员为陈晓。这个支队后由陈光斗带归决死二纵队（后将陈晓调回）。1939 年 8 月，以翼城、浮山、沁水、阳城、曲沃、绛县自卫队组成的政卫四支队和第五专署民族革命中学组织的游击队合编成三十二团。团长为胡正平（红军干部）政治主任贾启允。到十二月事变时，决死三纵队已发展到 6 个团，约近 6000 人（不包括五专署两个保安团）。

日军在台儿庄会战失利后，我七、八总队为配合徐州会战，会同国民党军 3 个师包围了曲沃县城。1938 年 6 月下旬，日伪军共 2000 余人，分南北两路为曲沃城内之敌解围。29 日，敌进到滏河北岸我八总队阵地前沿曲村、北赵一带时，国民党军的 3 个师只留下

1 个营，配合我八总队在绵岭、秦岗一带布防，其余部队全部撤走。7 月 1 日，敌人越过滏河向秦岗我八总队防地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我八总队二大队阵地被敌突破，三大队被敌包围。我指战员奋不顾身，连续激战 4 日，共毙、伤敌 500 余人，击落敌机 1 架。我三大队大队长李荫汉、二大队附王鸿猷、分队长郝凯、张问高等同志不幸牺牲，八总队共伤亡 300 余人。配合八总队的国民党军的那个营也英勇作战，伤亡较大。

秦岗战役，我军虽然损失很重，但对曲沃、翼城一带人民印象较深，鼓舞极大。时至今日，那里的人民犹念念不忘。

打罢古逻、沁水、秦岗三次硬仗以后，我们遵照党中央洛川会议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略战术的决定和朱总司令的指示，总结了经验。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阵地战、攻坚战是不会成功的，指战员虽然十分勇敢，但战果小而损失大。因此，决定进一步学习八路军，改变战术，只打山地的、分散的游击战，不打大的、集中的阵地战。这一改变，效果果然很好。从此，我们部队打了很多小规模的、漂亮的、胜利的游击战。现在只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战例来说说。

1938 年 7 月下旬，日军 1 个联队为支援其在晋南进攻中条山的部队，由豫北博爱，经晋城、阳城、沁水、翼城至曲沃，开辟了一条简易运输线，经常汽车往来，运输武器和给养。一日，敌人一个运输大队 300 余人，载重汽车 100 余辆，由阳城向沁水前进。我们得知后，觉得这正是我军伏击的好机会。我七总队部分兵力，协同国民党军李默庵部，埋伏于翼城、沁水之间的东坞岭曲高公路南北两侧。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突然枪炮齐发，击毁为首的几辆汽车，堵塞了公路。敌人进退不得，乱作一团。经一天激战，生俘敌军 30 余人，其余全部被歼，敌汽车全部被击毁，缴获辎重甚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七总队毙伤敌 10 余人，俘敌 4 名。

继东坞岭胜利之后，我九总队又伏击了一股由临汾窜扰浮山之敌。当敌人先头部队进到我在浮山境内的伏击圈后，我突然发起

猛攻，枪炮手榴弹齐发。敌人惊慌失措，回头就跑。一小时结束战斗。打死敌军 30余人,缴获迫击炮 2门、步枪 30余支。我伤亡很少。我八总队也接连打了三次胜利的小战斗。一次是夜袭同蒲铁路临汾至洪洞一段，毙敌 2 人，缴获步枪 3 支；一次是在曲沃交里桥袭击一小股窜扰之敌，缴获战马 2 匹；一次是在翼城符册遇到 7 个敌人，正在老百姓瓜田里抢吃西瓜，我军战士闻讯出击，敌人夺路逃走。我军穷追不舍，直追至曲沃羊舌村，除 2 名敌人逃跑外，3 人被打死,2 人被活捉,缴获步枪 5支。这两名俘虏中,一个就是后来参加日人反战同盟的吉田太郎。此外，我游击十团、游击十一团、三十二团和游击十支队等部队，在晋南、同蒲铁路南段沿线一带，破坏铁路，割电线，袭击小股敌人，也取得多次胜利。1939 年敌人占领长治一带后，有一次，我一个游击小组在组长岳岱（清华大学学生，后来在另一战斗中牺牲）带领下，在长治小宋村歼灭了一小股敌人,俘敌 1 人,缴获战马 1 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1938年 6 月下旬，我兼任长治地区第五专署专员。7、8 月间，专署成立了保安司令部,下辖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先后由陈光斗、颜天明和我兼任。王子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处长，车敏瞧任政治主任。可以说，这支队伍是决死三纵队的孪生兄弟部队。 8月，陈光斗被调到二战区长官部任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这个指挥部始终未健全起来发挥作用，陈实际被架空）；北方局朱瑞到长治决定建立五专署党团，领导五专署和牺盟长治中心区工作。我任党团书记,黄镇、廖鲁言、王兴让为党团成员(廖走后,补杨献珍为党团成员）。从此，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专署，对纵队的工作管得就少了。

1939年 6月,专署将保安一、二、四支队和政治保卫营,分别合编为两个保安团。保安九团团长为于文华(旧军官),政治主任张恒业 保安十团团长为卢有年(旧军官),政治主任陈学文。

我任专员后，决死三纵队司令部和各总队各游击团也陆续由浮山、翼城、沁水转移到长治一带这个上党小盆地来了。专区共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平顺、壶关、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浮山等 12 个县,对三纵队的供给,有一定的帮助。

临汾失守后,二战区长官部仓皇退到晋西。我决死三纵队没有领到军饷和弹药,即开赴前线。几千人的吃饭问题,官兵的生活费补助问题,以及弹药问题,发生了困难,不得不向薄一波领导的三专署、部队驻地各县政府借钱发饷和向群众赊购粮食。同时,不得不派部队越过日军几道封锁线,费一两个月的时间从晋西、陕西宜川领取军饷和弹药。所领回的军饷,二战区长官部常打折扣,只按旧编制的人员拨发,不管新增加的编制人员。同时所谓现款,也只发一些山西发行的钞票和“戒烟药饼”①,很少发实物。因此,新增加的部队供应和晋钞贬值的损失,就靠五专署补贴了。

决死三纵队到长治一带后,由于环境改变,部队集中,因而加强了整训,部队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迅速提高。党组织也有较大发展。

1937 年 11 月杨献珍来到决死三总队后,加强了军政干部的培训工作。先办起了第二战区第三随营学校。1938 年 1 月,随营学校改为民大四分校。这时党派了不少党员和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分校当教师。如刘文华、张立森、宋净明、黄其琮、殷实、叶笠、张结等同志。同年 4 月,民大四分校兼办决死三纵队军政干部学校,还有一个专门训练排长、班长的训练队。到长治后,又从干校抽调梁明等协助办了五专署民族革命中学。

这个军政干校,基本上是仿照抗大精神办的。曾请朱德总司令到校讲过话,并数次派学员到八路军和抗大一分校参观学习。

① 1920 年前后,阎锡山在山西曾一度严禁吸食、贩卖鸦片。由于部分上层人物作梗,这项政令不能贯彻执行,结果不但鸦片没有禁止,反而进入了大量吗啡、金丹、料面等毒品。当时山西省每年流出银元到陕西等省约 200 万元。1931 年阎锡山从大连回晋后,鉴于财利外流,乃别出心裁,将没收的鸦片(后来在绥远还种了部分)改制成“戒烟药饼”。名为戒烟药品。实是鸦片公卖以获厚利。抗战以后,阎缺乏实物补助军队,乃以所存‘戒烟药饼’充作部分军饷。

军政干校从开办到 1939 年 8 月撤销,前后共训练 1500 余人些学员，以后便成了决死三纵队的骨干力量。

决死三纵队党员较少。由于原教导十团、六团、七团党员不多（教导十团初成立时，仅有党员 4 人),加之当时根据上级党的指示,1938 年初曾一度停止发展工作，所以部队到长治地区时，全纵队才只有 100 多个党员（派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 20 多位同志未计在内)。同年 11 月间，朱总司令到长治，要我们汇报三纵队党的情况。当郝廷珖、燕登甲两同志报告到党员数自时，朱总司令认为发展过少。他指示我们,要大胆加快发展“就像母鸡下蛋一样,走到哪里下到哪里,一个下几十个、几百个”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在纵队政治部成立了做党务工作的秘密机构，公开叫牺盟特别管辖部，抽调了几个干部，专职从事发展党的工作。到十二月事变前，已发展到 300余人。但党员分布很不平衡,有的总队(团)多,有的总队(团)少 政工干部中的党员较多,战士党员少,军事干部党员更少。决死三纵队党员数量虽少，但质量较高。

三、反投降反顽固斗争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在侵华战略上有重大转变，一面把兵力重点转向占领区，加紧扫荡我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一面加紧推行诱降政策。

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极右派已经投敌。1939 年元旦前后，我晋东南三、五两专署联合召开了各界反汪、坚持抗日的群众大会。朱德总司令到会讲了话,反对汪精卫投降,表明八路军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大家鼓舞很大,更加坚定了晋东南军民抗日到底的信心。阎锡山与此相反,认为抗日抗不下去了,蒋介石也要投降,与其蒋早投降,不如他抢先一步。于是在 1939 年 3 月下旬,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会议,即臭名昭著的所谓‘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旧军军长以上、个别师长、新军纵队政委,行政专员以上、个

别县长，牺盟中心区以上干部。薄一波和我于 2 月 23 日到会。由于我没有参加过 1938 年 8 月的吉县古贤会议，对阎锡山的倒退图谋还不甚了解，所以对秋林会议曾有过幻想。不料一到，就发觉“气候”不对。这次会议是阎锡山积极推行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准备投降日本的会议。会议一开始，阎就定了调子。他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会议上，倒退与反倒退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焦点，而且斗争得十分激烈。旧派军人以王靖国为首，行政人员以邱仰浚、薄右丞为首，掀起了一股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阴风。新派以薄一波为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的坚定主张。阎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又说：“不能说汪精卫先生是汉奸。”薄一波说：“不能说汪精卫不是汉奸”，把他顶了回去。一次开会，阎一开始就说：“二战区兵员缺乏，财政困难……”。我看他又要归结到抗战抗不下去、要投降的老调上来，于是就说：“兵源不足，发动群众就可以解决，只要坚持抗战就有出路。”阎听了，立即变了脸说：“戎子和，你所答非所问，我是说书，你拉二胡，音调不同。”新派的人哧哧地笑了起来，续范亭立即作打油诗一首以讽之：“戎君高论甚堪钦，可惜所答非所问，你拉二胡我说唱，音调不同各西东。”

会议从 3 月底开到 4 月下旬，阎锡山一直顽固不化，新派感到讲什么也不起作用了，旧派则掀起一股吹捧阎锡山的妖风，说阎是“圣人”，“圣人的话还有错误吗”，肉麻刺耳，丑态百出。会议拖拖拉拉实在开不下去了，刘定庵（以晋察冀国民党身分同胡仁奎应蒋介石电召去重庆汇报，路过秋林参加了会议）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会场情景。诗的第一句记不得了，二、三、四句是：“形形色色各自处，你打油来我画画，有人提议带枕头。”由此可见一斑。最后，阎毫不顾新派的反对，以他奇怪的民主公式说“民主是要讲的，但最后还要以我的决定为主。”并片面作出决定：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

建立行政公署，缩小专区区划和专员权力，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山西各县的组织。

会议开完后，阎锡山本想羁留我们新派领导人在秋林，后因惧怕牺盟会和新军反对，5月中旬就让我们离开了。在我离开秋林前夕，阎锡山见我，别的话没有说，劈头就是一句："你这次回去，千万不敢反对汪先生。"这句话使我更确信他已下决心要投降日本了。

薄一波同我回到晋东南后，对阎锡山的倒退决定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我行我素，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我们回来一个多月，日军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进攻。从白晋公路进攻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在侵占沁县、襄垣之后，7月12日又侵占了长治、潞城、壶关、长子和屯留。决死三纵队各总队、游击团，由长治转移到长子、沁水、屯留以西一带。五专署和牺盟长治中心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我和王兴让带领，随决死三纵队一起行动，领导白晋公路以西各县工作；一部分由杨献珍、张茂甫带领，随保安九、十两团转移到壶关以东一带，领导白晋公路以东各县工作。

不久，孙楚的第三行署也来到晋东南。孙是第八集团军司令，行署主任是兼任的。他带来一个宪兵团、一个警卫营，还有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什么"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蛇蝎蚰蜒"。[①]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务指导员也跟着来了。他们来的口号是"开展政权"，实际上是夺取我抗日政权；"开展党务"，实际上是搞特务活动，打击牺盟会，瓦解决死队。

在孙楚等来以前，我决死三纵队和五专署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对日军、汉奸的斗争上。他们来后，迫使我们不但要前门拒虎，而且

① 1939年阎锡山为了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反对牺盟会、决死队，动员青年参加其"精建会""突击队""敌工团"等反动组织。可是好多青年不愿意参加这些反动组织。阎锡山为贯彻他的旨意，在讲话中，号召青年们不要怕当恶人，怕做蛇蝎蚰蜒，而且要以蛇蝎蚰蜒精神来进行活动。后来山西群众称"精建会"等反动组织中的人员为"蛇蝎蚰蜒"。

要后门防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用一定精力来进行反对倒退、反对分裂、反对顽固的斗争了。

秋林会议后，形势逆转。阎锡山为了要瓦解决死队，便挖空心思，采取了许多办法。我们也想了许多办法，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阎锡山抽调军队和行政干部到秋林受训，灌输他那一套反动的东西，并在训练期间，拉拢、收买、封官、利诱。我则有选择地调送人员，除他们指名要调训的（极个别的）外，送去的是立场坚定收买不了的，或受训回来不起作用的。

（二）五专署的民族革命中学办得很好，培训了大批干部。阎锡山害怕了，要派人接管，我们就组织全体学员和职工参军去打游击。他嫌我军政干校“抗大”化了，就派“精建会”的人来担任教官，专讲阎锡山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等谬论。不言而喻，他们这一套，我们干校当然不能接受，后来就设法把他们赶走了。同时，我们又以敌后战争环境办校不易、招生困难为由，报告阎锡山，宣布学校停办。阎认为反对他派教官到干校，是杨献珍的主谋，指名要调杨到秋林工作，实是谋害。后因学校停办，杨没有上他的当。

（三）我们在前方提倡军官减薪，缩小官兵生活差距。他们却在秋林大骂“艰苦卓绝是大逆不道”，又说“我发的军饷是全部的，谁打折扣，你们要找谁算帐”。我们借此揭露他们克扣军饷，不按发展的实有人数计算，只按原有人数照支的事实，提出我们新发展的几个游击团吃什么“抗人的是他们的山西“大花脸”票子，不是我们。同时指出，军官减薪是自愿接受的，这是进步的表现，有什么不好？对阎进行了反驳。

（四）阎锡山指使其“视察员”到处造谣生事，做假报告，并据此撤换坚决抗日的县长，另派他的爪牙接任。我们以铁的事实来反击“视察员”们捏造的谎言，指出他们是故意制造是非，不执行他们撤换的命令。阎就密电孙殿英，要他暗杀我陵川县长张维翰。孙将这份电报给我看了，张得以幸免。

由于阎锡山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倒行逆施，浊流所及，我决死三纵队内部斗争也剧烈起来。

秋林会议后不久，赵世铃即回来。我们按秋林会议有关决定，把决死三纵队分为两个旅：一为独三旅，一为一九七旅。具体分配是：独立第三旅旅长由颜天明兼任，政治主任由董天知兼任。下辖七、八总队和三十二团。一九七旅旅长是赵世铃，政治主任是张凤阁。下辖九总队、游击十团、游击十一团。这两个团是赵指挥不动的。后来，阎又派续亦龙（原游击十一团团附）任游击十一团团长。我们得知续在秋林受训时被阎收买了，同时，我们已先提升游击十一团一营营长刘修堂为团长，并已得到阎的同意，因此没有让续到任。

赵世铃升任旅长后，积极推行阎锡山反动顽固的一套，秘密召集他在九总队的亲信军官，商谈破坏部队中的反顽斗争。他们在部队散布流言蜚语说：“阎司令长官是我们决死队的父亲，还是八路军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一个还是两个？”质问我政工人员‘你们反顽固分子，请指明哪个是顽固分子？’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同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九总队政治部还把赵世铃的一些反动言论和在会议上的反动讲话，在九总队办的报纸上公开揭发出来，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同时，我们在部队中不断进行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如反对轻视政治工作，反对打骂士兵，反对欺侮老百姓，反对腐化堕落，等等。

由于阎锡山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国民党军队当然要积极配合，因而同我军的磨擦更加尖锐了。

在日军第 2 次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后，国民党大批军队在蒋介石反共防共政策指导下，以抗日为名，大批向太岳和太行南部我抗日根据地开来。五专区内除原驻在浮山、沁水的九十三军刘戡部，驻阳城的十四军陈铁部，驻壶关、陵川的孙殿英部外，又新增加了3 个军。即二十七军范汉杰部，进驻沁水、长子、屯留等县交界一带；四十军庞炳勋部，进驻陵川、高平；川军李家钰的四十七军回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